



中国
古代
文学
研究
丛书

中国

侠文化
积淀与承传

ZHONGGUO XIAWENHUA JIDIAN YU CHENGCHUAN

韩云波 ◆ 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ZHONGGUO XIAWENHUA JIDIAN YU CHENGCHUAN

中国侠

文化积淀与承传

韩云波 ◆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韩云波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刘明华主编)

ISBN 7-5366-6805-8

I. 中... II. 韩... III. 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141 号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

韩云波 著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蒋忠智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4 千 插页 2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6805-8/I·1208

定价:24.00 元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莫砺锋 钟振振

主编：刘明华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何宗美 黄大宏 熊宪光

胥洪泉 袁济喜 周英斌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 10 余年中国侠文化研究的集成性成果。以文化基因论、文化层次论和历史结构论为理论基础，梳理了中国侠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中国侠文化的基因传递与亲近线索，勾勒了武侠小说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轨迹以及中国侠文化在新的文化条件下更加广泛的表观方式，总结了中国侠文化的道义理想和英雄梦幻，就武侠小说的文化展现与审美展现作了饶有趣味的探讨。本书拓展视野，探讨了武侠小说所表现的中西方文化交融；更将视野拓展至当下现实，探讨了中国侠文化的新兴形式及当下侠性心理，分析了新时期“武侠热”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本书出入于理性论说和文化评论之间，逻辑严密，注重学理性探讨；行文活泼生动，注重可读性。



熊宪光教授在《史记》、《战国策》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先秦散文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和优势。而年轻一辈的学者们,在叙事学的研究方面,已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本辑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就有以现代小说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小说及小说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向的拓展,本学科的成员在文人结社、流民文学、文体研究、学术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已经或即将陆续发表。与此相关,本学科成员目前承担的各级各类重要项目,有力地支持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本学科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一批富有锐气的博士加盟本学科,为学科发展增添了活力。除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和陆续出版的丛书,本学科同志近年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文献》、《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本学科在本科教学中素有优势,并不断继承传统,有所发扬光大。在教学成果方面,已数次获得学校和省市的优秀成果奖。2004年,本学科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申报获准“中国古代文学”为校级和重庆市的“精品课程”,并推荐教育部备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正是对本学科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综合成就的肯定。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



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本丛书的出版,只是本学科几十年学术发展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活动而已。既不是开端,更不是终结。可称得上是近年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部分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套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将陆续推出。为展示本学科的传统,老一辈学者未刊的重要成果,也将陆续整理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积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在学校和文学院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等重要学术会议。作为重庆市的重点学科,还负责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对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学科长期得到学术界的前辈、师友和同好的支持。希望,也相信这样的支持会继续,因为我们对学术都怀有敬意和热情。

谢谢学校和重庆出版社对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自序

一

从“纵死犹闻侠骨香”到“乱世天教重侠游”，从“一簪一剑平生意”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中，产生了中国侠文化。

关于中国侠文化，我在1995年的《侠林玄珠》一书序篇里认为，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广义的侠文化，包括侠的文化存在（即侠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和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和侠的文化积淀（即民族性中的侠文化心理或称“侠性”）；第二个层次是狭义的侠文化，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侠的行为文化（诸子百家及史书传记之游侠）和侠的精神文化（文艺作品之武侠）。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

侠文化是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它肯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无疑弥漫于中国传统文化各个角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侠文化作为支流文化



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对,作为理想形态或想像形态与社会生活现实形态的相对,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安定因素与要求稳定与和谐的历史文化惯性的相对,以及作为大众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相对……构成了中国侠文化独特的复杂性质。中国侠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改造”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主流文化,在历史的矛盾统一中,中国侠文化始终保持着惟中国而有“侠”的特色。

如果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说,人类又始终有被拯救的欲望和得到更多自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神仙、菩萨、上帝、真主等有相近似的性质。不过,侠毕竟又和神佛等不同,神佛的基础是宗教的“天命”,而侠的基础是人间的“正义”。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不公平的正义”,庶几可以解释侠的一些相关问题。所谓“公平的正义”,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形式上的公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庶几近之;而“不公平的正义”则是“利益获得最少的最大权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侠的锄强扶弱庶几近之,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助的就是“弱小”或“利益获得最少”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侠实际上表现了一些基本的人性。要行侠,孔武有力的人,可以挺身而出为武侠,勇斗暴徒;即便“力且不足缚一鸡”,仍可如汤显祖《紫钗记》“把剑谁无义,挥金却有仁”,亦可如张恨水《剑胆琴心》自序所言以笔墨聊抒侠气。于是,不仅有武侠,亦且有文侠;不仅有身侠,亦且有心侠;不仅豪杰可以为侠,细民亦可以为侠。中国侠文化就这样应和着人



类与民族的共性而浸润开来,成为一种国民性。

当然,中国侠文化也有它的另一面,任侠行为毕竟是一种叛逆和破坏。在封建文化中,儒是保守主义者,侠是自由主义者,侠可以参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并起到助推作用。但在今天的法制时代,侠可能仍是社会平衡的助推力量,又可能是法制的敌人。金庸在1981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发表《韦小宝这小家伙!》,十分明确地提醒大家:“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从这里,可以引发出我们对中国侠文化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两点立场:

一是在中国人的现代体验中,要有正确的“间离”意识。

二是中国侠文化无疑有它继续存在的理由。

我相信,这是今天对待中国侠文化的辩证态度。

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的理论建构,受到了三种文化理论的启发。

第一是“文化基因论”。

这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得到的启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然而,其最核心

的层面却是从一开始就贯注于这个民族的“童年情结”或“原始思维”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特别重视文化人类学对原始思维的研究的原因。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人们特别重视“十三经”,特别重视先秦诸子,大致都出于同样的道理。在本书中,我试图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然而,已经不是原始思维,而是在侠正式和大规模产生之前的先秦时代的思想文化体系),来探求中国侠文化的“文化基因”,以求得对于中国侠文化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的说明,所以,本书使用了大量的先秦两汉的历史资料,对这些资料的阐释,篇幅几乎占到了全书的近半。

第二是“文化层次论”。

这是英国著名的新左派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据此可以推导出文化的三个层次^①:

“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这实际上就是经典的或精英的文化定义,由此推及的文化层次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和地点活生生的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

“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

^①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37页。



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这是历史记录意义上的文化,由此推及“各种被记录的文化,从艺术到最普通的事实”。

“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这是近于“社会史”的文化,由此推导出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也存在把活生生的文化和时期文化相联系的因素,选择性传统的文化”。

在这三个层次文化的研究方法中,威廉斯特别强调了“感觉的结构”,或即“对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把特殊活动结合成一种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感知”。他提到了弗洛姆的“社会特征”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而威廉斯的“文化层次”,显然要比他们更加微妙和细腻。

中国侠文化就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活动”,借鉴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就是要寻找中国侠文化的“感觉的结构”。当然,要完整地表述中国侠文化的细致的文化现实,是一部大书的任务,远不是此处这本小书所能胜任的。

第三是“历史结构论”。

这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杰出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来的。布罗代尔在1949年出版的《腓利普二

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总体史”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把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由此可以将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将有助于更深入、更完整地观察历史。在他的进一步研究中,三个层次的历史运动是在三个层次之中以三种不同速度发生的,可以进一步表述为:

第一层次:长时段的“结构的历史”,“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凉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第二层次:中时段的“局势的历史”,“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首先是依次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进行研究。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复杂的范畴内怎样起作用”。

第三层次,短时段的“事件史”,“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保尔·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撰写的事件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①。

我曾提出,可以从布罗代尔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在文学史研究中树立“整体史”观念^②。我在完成博士后

① 以上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腓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一版序言,第8—9页。

② 韩云波《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

课题“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文类发展动力系统研究”以及本书的写作中,都尝试从较为广阔的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或“整体史”历史观中得到启发。

三

到目前为止,我对中国侠文化的关注已历十余年,这中间经历了研究对象、范式和观念的变迁。

最初接触中国侠文化是从阅读武侠小说开始的。读过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没有署名的一本《残肢令》(后来才知道作者是陈青云),时为1986年,血腥、残忍、怪诞,并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但后来读的《七剑下天山》和《书剑恩仇录》,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好看,而且颇有回味的余地。也许是“螺旋式上升”吧,竟然从中开始了对中国侠文化的浓厚兴趣。1990年开始结合中国侠文化进行文学研究,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江汉论坛》1991年3期论《水浒传》的一篇文章,责任编辑为张仲良先生。接着,从中国侠文化角度讨论鲁迅、郭沫若、陈子昂的文章先后发表。这是我研究中国侠文化的“自发阶段”。

从1992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对中国侠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侠文化形态论”和“游侠史论”(先秦至唐)两个系列的十余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这时才进入我研究中国侠文化的“自觉阶段”。

1994年7月,动笔撰写《中国侠文化系列丛书》一套四种,次年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出了中国侠



文化的四个重点：游侠、武功、江湖、武侠小说。该书出版后，国内有约 20 家报刊发表书评及报道，并在西南师范大学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中，名列仅有的两项学术著作一等奖之一。这可以说是对我历时四年的中国侠文化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5 年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力衰，病痛缠身，我遂忙于家事，同时准备考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侠文化的继续探讨。1998 年，我考上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定为《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顺便发现初唐的笔记小说《朝野僉载》里的“北齐稠禅师”等作品，实与武侠小说在唐代的线索有重要关系，可以牵系到佛教密宗经典在唐代的传播，下启晚唐的豪侠小说^①，但因并非当时的研究任务所在，并未对此点加以展开。

2001 年 9 月，我进入武汉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选定了“中国现当代武侠小说文类发展动力系统研究”为研究课题，试图从理论角度对中国侠文化研究进行学理性的提升。博士后报告于 2003 年 10 月完成出站。

目前，我所从事的中国侠文化研究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继续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对先秦两汉诸子进行深入发掘，力图以中国侠文化作为一个窗口，窥见更多的中国文化奥秘，作为这项工作的一个必要基础，同时也开展了对中国侠文化文献资料的整理（先秦至

^① 参见韩云波《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9—234 页。



唐);二是关注中国侠文化的当下应用,作为栏目主持人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开设了“21世纪中国侠文化”栏目,在每期都有的“主持人语”中,我力图对中国侠文化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拓展,既在广义的范畴内开展对中国侠文化的研究,团结有关力量,亦以力推“21世纪中国大陆新武侠”为重点,并联合了《今古传奇武侠版》等刊物共同展开这一工作,广泛与大陆新武侠作家进行对话,力求对当下中国武侠小说原创略尽绵薄。

四

我常常认为做学问亦须快乐适意,生活如此美好,人生如此灿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享受?中国侠文化中有血气方刚的正义与壮烈,有前赴后继的愤激与悲怆,也有许多美好的境界,是人生向上和向前的力量,是事业发展和进步的启示,洋溢于我们的生活中间,成为中国侠文化恒久和广泛的魅力。

我在一个空旷的教室里,忽然发现,摊开的笔记本下,有一行行的“课桌文学”——这本是常有的事——竟然是三个两寸见方的大字:“李寻欢”——古龙笔下著名的“小李飞刀”,一个执著地身体力行着“爱是永恒”的大侠。他和令狐冲、楚留香、朱家、陈遵、谭嗣同等等,岂非正是我们的文化与生活的某种昭示?

我努力将这本小书写好,至于能否如愿,则只有等待大家的评说了。

这仅仅是一块砖,作用在于引出真正的美玉。

是为序。